

元荣抄经与莫高窟第 249 窟的营建关系探析

魏健鹏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摘要:莫高窟第 249、285 窟南朝风格的出现, 与北魏宗室元荣在孝昌元年(525) 就任瓜州刺史并无直接联系, 而应与普泰二年(532) 元荣之子叔和进京一事有关。其中, 第 249 窟可能是元荣为庆祝叔和完成沟通京师的使命并平安归来而营建, 该窟覆斗顶东披的祥瑞图和南北披的升仙与狩猎图组合也见于同期中原的鲜卑贵族墓中, 反映出敦煌与中原鲜卑贵族在图样选择方面的共同喜好; 西披的维摩诘经变则是以《见阿闍佛品》为主要表现内容, 其绘制与元荣出资抄写百部《维摩疏》祈求叔和平安归来一事相呼应, 成为同一件事在文本和图像上的两种表现方式。

关键词:莫高窟第 249 窟 元荣 叔和 维摩诘经变 南朝风格

中图分类号: K879.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2020)01-0124-11

研究者通常将敦煌石窟南朝风格的出现与元荣在敦煌的经历相联系, 主流观点是将莫高窟第 285 窟视为其参与营建的洞窟。贺世哲先生指出, 第 285 窟南壁的五百强盗成佛图与西壁的密教图像在功能上有使恶贼退散、巩固统治的作用, 符合元荣巩固地位的意愿, 并且北壁西起第一铺说法图下方的供养人可能就是东阳王家族成员。^①段文杰先生进一步指出, 该窟壁画涉及《法华经》《大般涅槃经》和《无量寿经》等, 与元荣抄经内容一致。^②宿白先生则认为, 莫高窟第 249 窟覆斗顶南北披的图像为帝释天和帝释天妃乘车去礼佛的场景, 由于帝释天与梵天王常住佛左右, 故可代表释梵四天, 因此该窟的营建目的和元荣出资抄写与天王相关的佛经相同, 都是为天王建功德。^③由于元荣在抄经和洞窟营建活动中都留下了记录, 前辈学者尤其段文杰、宿白先生将抄经和建窟活动结合的研究方法, 为我们认识元荣在敦煌的事迹提供了绝佳路径。本文拟从分析

收稿日期: 2019-01-06

基金项目: 兰州大学“一带一路”专项项目“中西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敦煌藏经洞绘画品研究”(2018ldbryb010)

作者简介: 魏健鹏(1985-), 男, 甘肃敦煌人。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美术考古与敦煌学研究。

① 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时代》,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年, 第198页。

② 段文杰《中西艺术的交汇点——莫高窟第二八五窟》, 敦煌研究院编《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艺术卷》,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0年, 第53页。

③ 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年, 第250-251页。

元荣的抄经活动入手，辨析敦煌石窟南朝风格的出现，可能与普泰二年（532）元荣之子叔和进京一事有关。第 249 窟覆斗顶西披的图像应为维摩诘经变，其绘制与元荣抄写百部《维摩疏》的行为一致，是同一件事的两种表现形式。分析欠妥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元荣之子叔和进京与敦煌南朝风格及升天狩猎图像组合的出现

北朝时期，敦煌呈现出南朝风格的洞窟仅有莫高窟第 249 和第 285 窟。第 285 窟的营建时间较为明确，该窟北壁六组说法图下方的题记有四处保留有纪年，最晚的为“大统五年（539）五月二十一日”，因此洞窟应在断续进行的过程中完工于此。第 249 窟的营建时间虽无明确记载，但根据该段洞窟在崖面的分布呈现出自南向北时代渐晚的趋势，加上第 249 窟周围多以北魏及时代相近的洞窟为主，而第 285 窟位于第 249 窟的南部，且相邻洞窟多为北周隋至唐前期开凿，因此，可能在时间上稍晚一些。宿白先生也指出“该窟的年代适早于有大统四年发愿文的第 285 窟。”^①但未说明具体理由。反观元荣至敦煌任瓜州刺史的时间，一般根据其妹元华光《魏故金城郡君墓志铭》中“瓜州荣第二妹”的记载，确定为孝昌元年（525）九月以前。^②另据日本书道博物馆藏《观世音经》题记中出现“扈从主人东阳王殿下届临瓜土”的记载，^③可知元荣获封东阳王之称号也不晚于该卷抄写时的孝昌三年（527）年四月。如此一来，若将第 249 和 285 窟新风格和题材的出现，归结为十余年前元荣到来时所携带的粉本等因素，似乎显得有些笼统。

元荣是虔诚的佛教徒，敦煌遗书中多处保留了元荣的抄经题记，其中有一则是关于其子叔和前往京师洛阳“诣阙修定”的记载。普泰二年（532）三月二十五日，元荣出资抄写《维摩疏》百部，祈望叔和早日归来。上图 111 号《维摩疏》的尾题即是该次抄写活动的记录：

大代普泰二年岁次壬子，三月乙丑朔，廿五日己丑，弟子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领西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瓜州刺使东阳王元荣。惟天地妖荒，王路否塞，军臣失利，于兹多载，天子中兴，是得遣息叔和，诣阙修定。弟子年老疹患，冀望叔和早得回还。敬造《维摩疏》百部供养。^④

叔和是否平安归来，我们无从得知，但鉴于其王室成员的身份，在沿途安全和供给方面，应较普通人更有保障，另从元荣在稍后一年间的抄经题记中并未出现超度亡者的功德诉求来看，叔和当未遭遇不测。相对而言，第 249、285 窟南朝风格和新题材的出

① 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第 251 页。

② 文梦霞《再论东阳王元荣领瓜州刺史的时间》，《敦煌研究》2006 年第 2 期，第 101-105 页。

③ [日] 矶部彰编集《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卷上，东京：二玄社，2005 年，第 115 页。

④ 上海图书馆等编《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57 页。

现更接近于叔和的返回时间，可能是叔和从洛阳返回时带来了中原的工匠或粉本。另从这两个洞窟尤其第249窟覆斗顶东北三披的祥瑞、升仙及狩猎图的组合、风格和配置方式等方面来看，与东魏北齐时期的壁画墓尤其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非常相似。有研究者指出，九原岗墓的壁画布局与东魏北齐时期高等级墓壁画保持一致，^①也能说明这些内容组合的出现要晚于元荣到敦煌的时间，而与叔和前往洛阳时更为接近。



图 1



图 2

(图1 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甬道入口墓门上方壁画线图，采自《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图2 莫高窟第249窟覆斗顶东披画面，采自《中国敦煌壁画全集·西魏卷》)

北朝前后北方诸地墓葬图像中流行升天图和狩猎图或二者并存的画面，诸如辽宁朝阳袁台子壁画墓、内蒙古和林格尔鸡鸣驿鲜卑壁画墓、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河北磁县茹茹公主墓和湾漳大墓、山西忻州九原岗壁画墓、固原雷祖庙北魏漆棺画等，^②其中出现南朝风格者又以东魏、北齐时期居多，主要以磁县茹茹公主墓、湾漳大墓和忻州九原岗壁画墓较有代表性，与莫高窟第249窟覆斗顶的图像内容和配置方式有密切关联。河北磁县茹茹公主墓和湾漳大墓的形制及壁画题材都较为相近，两墓甬道两壁分别为残损的大幅青龙白虎与仪仗队伍或升天图等画面，尽头墓室入口处上方的壁画保存相对较好，都绘制了以朱雀为中心的各类祥禽瑞兽组合的祥瑞图像。以湾漳大墓的祥瑞图像为例(图1)，中央为一只朱雀正面向前，冠羽中有一组发光物体，两侧自上而下分别相向绘有禽鸟、翼兔和力士等形象。莫高窟第249、285窟覆斗顶东披绘二力士或伏羲女娲护持摩尼宝珠，两侧自上而下排列飞天、禽鸟及各种瑞兽等(图2)，其内容及构图

① 瞿鑫《山西九原岗北朝壁画墓研究论》，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15页。

②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朝阳地区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县文化馆《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第29-45页；田立坤《袁台子壁画墓的再认识》，《文物》2002年第9期，第41-48页；胡芳《鲜卑——统一中原的第一个北方少数民族》，《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第10期，第275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文物》1990年第12期，第1-10页；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第1-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考古》2015年第7期，第51-74页；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北魏墓漆棺画》，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页。

与湾漳大墓的祥瑞图像相似度非常高，二者的粉本应当存在密切关联。

山西忻州市九原岗的北朝壁画墓则保存非常完好，该墓在形制上与磁县湾漳壁画墓基本一致，墓道长度、宽度也大于东魏茹茹公主墓、北齐东安王娄睿墓等，发掘者推测墓主人应是东魏或北齐统治集团的一位重要人物。^① 该墓墓道左右两壁绘有内容庞杂的升天与狩猎图组合，上层的天界充满云气纹，并有御龙和乘鹤前行的人物以及各类神兽图像（图 3），下一层则是生动的狩猎场面，这些画面组合的内容及风格都与莫高窟第 249 窟窟顶北披（图 4）的男性仙人驾龙车和狩猎图组合的图像颇为相似，并为研究者多次提及并进行比对。瞿鑫先生在关于该墓的综合研究中多次将二者的神仙世界图像与狩猎图之间的共性特点进行比对。^② 扬之水先生也指出，九原岗壁画墓甬道南北壁画面稍事削减移植到河西的佛教艺术，便是莫高窟第 249 窟。^③ 因此，敦煌这些全景的祥瑞图、升仙图 and 山林狩猎图在同时一起出现，应当并非周边地区丁家闸五号墓一类的魏晋墓发展而来，而与中原东魏北齐墓葬图像的关联更密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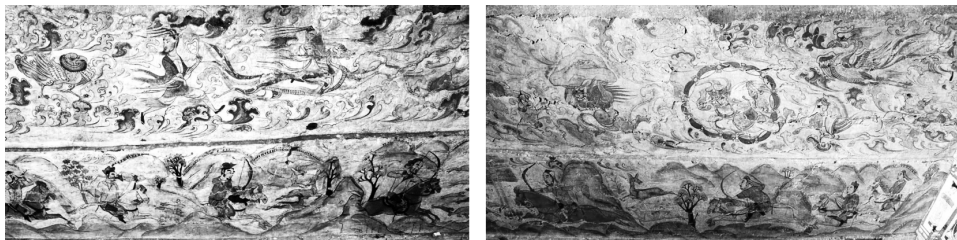


图 3 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壁画墓墓道东、西壁壁画局部
(采自《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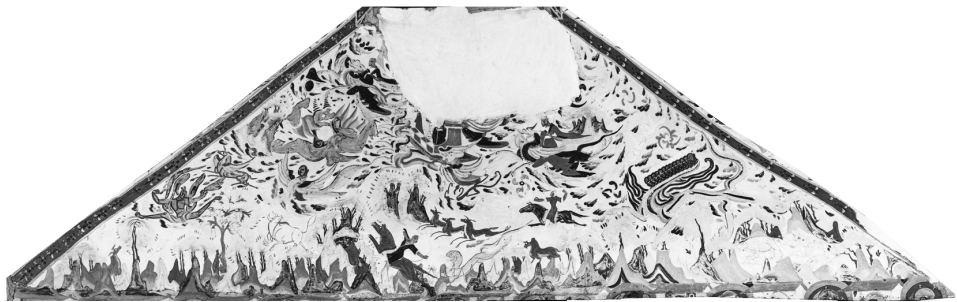


图 4 莫高窟第 249 窟覆斗顶北披画面
(采自数字敦煌 <https://www.e-dunhuang.com>)

莫高窟第 249、285 窟覆斗顶东披和磁县茹茹公主墓、湾漳大墓内容相近的祥瑞图像，都共同出现于入口的上方，第 249 窟覆斗顶南北两披和山西忻州九原岗壁画墓甬道

①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考古》2015 年第 7 期，第 72 页。

② 瞿鑫《山西九原岗北朝壁画墓研究论》，第 21-23、42-48 页。

③ 原文误作第 285 窟，相关插图示例为第 249 窟北披图像。见扬之水《忻州北朝壁画墓观画散记》，《大众考古》2014 年第 3 期，第 74 页。

南北壁内容相似的升仙与狩猎图组合，也都出现在中轴线的左右两侧，可见这两个洞窟尤其第249窟覆斗顶各披壁画，在配置方式上明显受到同期墓葬甬道壁画的影响。虽然墓葬与石窟在功能上截然不同，但升天和往生净土在终极理想的诉求上却大体相同。李雅君女士指出九原岗壁画墓主室墓门上方出现大莲花、摩尼宝珠、神鸟、宝树等内容，共同组成了一幅净土观想图像。^①这更可以说明升天和净土往生的相关图像不必专属于某一种建筑形制，可以在两类不同建筑空间互相借用。第249窟覆斗顶东披和南北披的图像同时见于元魏时期鲜卑高级贵族墓葬当中，似乎也能反映出敦煌与中原的鲜卑贵族，都对这类祥瑞、升天和狩猎图像的组合存在偏爱。

在第249、285窟营建之时，最近一次的敦煌与中原重要往来的记载，当莫过于元荣之子叔和进京一事，由于这次进京的任务是“诣阙修定”，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交流往来。因此，可能是叔和从京师洛阳归来时，携带了这些后来在东魏北齐鲜卑贵族群体中较为流行的新图像粉本。

二、元荣抄经与第249窟维摩诘经变的绘制

元荣在敦煌期间出资抄写了大量经书，题记记录的时间主要在北魏永安三年至永熙二年（530-534）之间。我们将这些题记中所见的抄写内容、数量及功德诉求整理如下表。

表1 元荣抄经内容数量及功德诉求一览表

时间	题记来源	抄写内容与数量	功德诉求
永安三年 (530) 七月廿三日	BD. 09525 《仁王般若经》	《仁王般若经》三百部	乞延年……
	京都博物馆藏《仁王般若经》		一百部仰为梵天王，一百部仰为帝释天，一百[部]仰为比(毗)沙门天王等。以此经力之故，速早成佛。救护弟子，延年寿命，上等菩萨，下齐彭祖。若天王誓不虚发，并前所立愿，弟子晏望延年之寿，事同前愿。如无所念，愿生离苦也。
建明二年 (531) 四月十五日	S. 4528 《仁王般若经》	《仁王般若经》	愿天王成佛，弟子家眷奴婢六畜，滋益护命，乃至菩提。悉蒙还阙，所愿如是。

^① 李雅君《九原岗墓室壁画中的佛教因素》，《美术观察》2019年第5期，第49-51页。

时间	题记来源	抄写内容与数量	功德诉求
普泰二年 (532) 三月廿五日	上图 111 佚名《维摩疏》	维摩疏百部	冀望叔和早得回还。
	P. 2143 《大智度论》	《无量寿经》一百部、《摩河衍》一百(卷)、《内律》一部、《贤愚》一部、《观佛三昧》一部、《大云》一部。	冀望叔和得早还回。愿天王等早成佛道,又愿元祚无穷,帝嗣不绝。四方付(附)化,恶贼退散,国丰民安,善愿从心。含生有识,咸同斯愿。
	京都博物馆藏《大智度论》		
	书道博物馆藏《律藏初分》		
永熙二年 (533) 五月七日	日本五岛美术馆藏《大方等大集经》	《大方等大集经》一部十卷、《法华》一部十卷、《维摩》一部三卷、《药师》一部一卷	愿天王成佛,弟子所患永除,四体休宁,所愿如是。
永熙二年 (533) 七月十三日	S. 4415A 《大般涅槃经》	《法华》、《大云》、《贤愚》、《观佛三昧》、《总持》、《金光明》、《维摩》、《药师》,各一部合一百卷	仰为比(毗)沙门天王,愿弟子所患永除,四体休宁,所愿如是。
不明	上图 112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一部	不明。

由上表可见,元荣的抄经内容有相当大的比例与护国有关,诸如其中的《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妙法莲华经》和《金光明最胜王经》即有护国三经之誉,对应到其功德诉求则基本皆为祈愿天王成佛,其次为救护自己所患永除、延长寿命等。诸多抄经中,唯有普泰二年(532)三月二十五日出资抄写的百部《维摩疏》,主要为祈求儿子叔和平安归来,这也是敦煌遗书中有记载的一次抄写《维摩诘经》相关文本最多的记录,似乎在元荣看来,《维摩疏》在某些方面与叔和平安早归有重要的联系。我们推测,作为来自洛阳的王室成员,元荣应对当时龙门石窟流行的维摩诘造像风气有所了解。龙门石窟作为北魏时期最重要的维摩诘造像制作区域,现存至少 129 处以维摩诘和文殊对坐为主要内容的石刻。根据张乃翁先生的统计,这些造像中保留有纪年的大部分造于北魏正光和孝昌年间(520-528),^①元荣正是在这一时段赴任瓜州刺史。在洛阳维摩诘造像正盛的背景下,元荣为求得叔和从洛阳平安归来,出资抄写《维摩疏》达百部之巨,这当中或许也部分的承载了其家乡洛阳的感情。可能受此影响,普泰二年之后,在元荣的几次抄经题记所记录的抄写内容中,基本都包含有《维摩诘经》。

在北魏末年“天地妖荒,王路否塞,军臣失利”的情形下,叔和完成出使洛阳的任务归来,应当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可以成为元荣进行洞窟营建的契机。与叔和离开时元荣出资抄写《维摩疏》的祈愿相呼应,在他归来后绘上相关的维摩诘经变,应当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① 张乃翁《龙门石窟维摩变造像及其意义》,《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第40-41页。



图5 莫高窟西魏第249窟覆斗顶西披画面
(采自《中国敦煌壁画全集·西魏卷》)

第249窟覆斗顶西披绘有阿修罗手托日月站于须弥山前，在其南北两侧下部绘有两身遥相对坐的人物（图5）。对于该画面的定名，学者历来关注热度颇高，然而将之认定为维摩诘经变的观点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最早有何重华先生认为第249窟整个洞窟都是用来表现《维摩诘经》的主要内容，并指出这些情节大部分是彼此包含、互相交织在一起，没有明确的叙事顺序。^① 宁强先生认为该窟西披中间的四目巨人为方相氏，维摩诘经变仅包括西披下部两侧的人物，文殊居南，维摩诘居北，维摩诘前方有一人在树上摘花，为《观众生品》维摩诘方丈室内的天女。^② 张元林先生在何重华先生一文的基础上，认为第249窟的维摩诘经变应包括整个西披，指出“阿修罗护卫须弥山”之图像表现的是《见阿閼佛品》中“手接妙喜世界”的内容，画面结构与第262窟西壁龕顶的维摩诘经变相近（图6），整幅画面表现《维摩诘经》中关于妙喜世界的净土信仰。^③



图6 莫高窟隋代第262窟西壁佛龕上方维摩诘经变线图
(采自《敦煌壁画全集·法华经画卷》)

虽然上述三位学者对第249窟壁画所涉及维摩诘经变的范围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但在这一过程前后，有更多学者认为画面中出现风雷雨电四神等中国传统神话题材，无法用维摩诘经变来解释，其主题仅是表达阿修罗护卫须弥山及忉利天宫^④、往生兜率

① Chonghua Ho, *Tunhuang Cave 249: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Vimalakirtinirdesa*, Ph. D dissertation of Yale University, 1985.

② 宁强《上士登仙图与维摩诘经变——莫高窟第249窟顶壁画再探》，《敦煌研究》1990年第1期，第32-33、36页。

③ 张元林《净土思想与仙界思想的合流——关于莫高窟第249窟窟顶西披壁画定名的再思考》，《敦煌研究》2003年第4期，第1-8页。

④ 段文杰《略论莫高窟第249窟的壁画内容和艺术》，《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年，第2页；贺世哲《敦煌莫高窟第二四九窟窟顶西披壁画内容考释》，《敦煌学辑刊》总第3辑，1983年，第28-32页；刘永增《莫高窟第249窟天井画内容新识》，敦煌研究院编《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卷》，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8-19页；王惠民《敦煌佛教与石窟营建》，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78-179页。

天^①或阿修罗召唤饿鬼见释迦牟尼佛^②等内容。受这些研究成果影响，一直以来在维摩诘图像的相关专题研究中，^③ 第 249 窟西披的画面从未被列入讨论范畴，体现出主流研究者的处理态度。即使在相关的图录中，亦仅有吴健先生在《中国敦煌美术全集·西魏卷》，将该画面定名为维摩诘经变。^④

上述两种观点的争议，主要在于风雨雷电四神与阿修罗护卫须弥山图像之间的关联问题，前者的论述往往回避四神图像，后者则又多忽略下部两侧的对坐人物。我们认为该画面仍然是以《见阿閼佛品》为主要内容的维摩诘经变，四神图像应当主要是用来作为天空或上方世界的象征，并没有明确的内容指代意义。相同特征的四神图像还见于莫高窟初唐第 329 窟龕内（图 7），在乘象入胎和夜半逾城两个主体画面的周边，是风雨雷电四神和飞天共同构成的天界环境，四神的出现并未分散画面主要情节的表达。类似的表现方式在敦煌应当具有悠久的传统，在后来构图较为成熟的维摩诘经变，诸如莫高窟第 61 窟东壁维摩诘经变的《见阿閼佛品》中（图 8），除了阿修罗双手所托举的日月以外，在须弥山两侧的空间中再次出现了日月，左侧的白色月亮中绘有植物，可能是月桂树的象征，右侧的红色太阳中绘有三足乌。在这种借用传统神话题材的表现方式中，第 249 窟覆斗顶西披的四神与第 61 窟东壁维摩诘经变太阳中的三足乌图像，虽然都不属于经变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应当都具有相同的天界象征意义，整体画面表现的内容仍然是以《见阿閼佛品》为中心的维摩诘经变。



图 7 莫高窟初唐第 329 窟西壁龕内佛传故事及四神图像

（采自数字敦煌 <https://www.e-dunhuang.com>）

- ① [日] 斋藤理惠子著，贺小萍译《敦煌第 249 窟天井中国图像内涵的变化》，《敦煌研究》2001 年第 2 期，第 157-160 页。
- ② 马兆民、赵燕林《西魏〈大方等陀罗尼经〉的流行与莫高窟第 249 窟的营建》，《中国美术研究》2017 年第 4 期，第 34 页。
- ③ 金维诺《敦煌壁画维摩变的发展》，《文物》1959 年第 2 期，第 3-9 页；陈清香《维摩诘经变相》，张锡坤主编《佛教与东方艺术》，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年，第 434-448 页；贺世哲《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敦煌研究》试刊第 2 期，1982 年，第 62-87 页；Fan Lin, *Visual Images of Vimalakirti in the Mogao Caves (581-1036)*, Montreal: Master degree dissertation of Magill University, 2006；邹清泉《虎头金粟影——维摩诘变相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卢少珊《佛教寺院维摩诘经图像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肖建军《图像与信仰——中古中国维摩诘变相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5 年。
- ④ 吴健编著《中国敦煌壁画全集·西魏卷》，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年，第 8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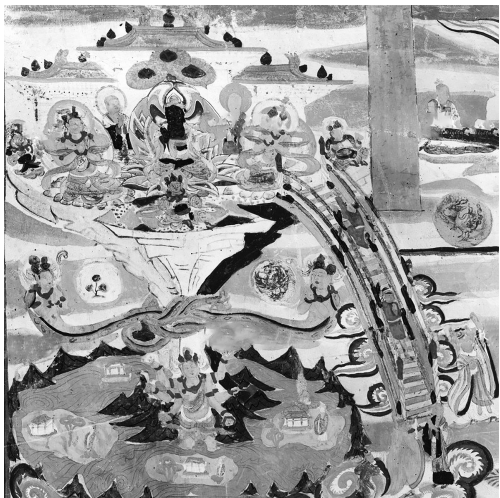


图8 莫高窟五代第61窟东壁维摩诘经变《见阿閼佛品》(采自数字敦煌
<https://www.e-dunhuang.com>)

综上所述,可能正是由于《维摩诘经》文本在元荣抄经中具有如此特殊的地位,使之可以在壁画的绘制中占有重要位置。第249窟覆斗顶西披是距离主尊最近的大幅空间,大体满足这一特征,适宜绘制维摩诘经变,其出现应当与普泰二年元荣出资抄写百部《维摩疏》相关,是同一事件在文本与图像层面的不同表现方式。

元荣所抄《维摩疏》现存280余行,所注底本为鸠摩罗什译本,在历代经藏中并未保留,每品所述内容较为简略。该注疏涉及第249窟维摩诘经变中重点表现的《见阿閼佛品》部分仅有8行,主要解释该品开端维摩诘回答释迦观佛的方法,关于此后维摩诘断取妙喜世界和无动如来的内容,并未作涉及。《维摩诘经》中共出现须弥相国、香积佛国和妙喜国三处他方净土,但仅有《见阿閼佛品》关于妙喜国的叙述中涉及诸人发愿往生并获得如来授记:“现此妙喜国时,娑婆世界十四那由他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皆愿生于妙喜佛土。释迦牟尼佛即记之曰:‘当生彼国。’”^①因此,就第249窟维摩诘经变的图像结构而言,以往学者将之解释为对妙喜国净土的信仰,仍然存在合理性。

三、元荣功德窟的再判定

虽然宿白先生曾指出元荣的功德窟应为第249窟,但在相关研究中多被视作另类。研究者一般倾向于认为元荣参与营建了第285窟,主要论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将壁画题材的内容或功能与元荣的身份或相关的抄经活动相联系;二是将该窟北壁西侧第一组说法图(图9)下方的供养人比附于元荣家族成员。我们从同列其它说法图和题记的表现方式上,可知各说法图下方的供养人所出资绘制的图像应当仅涉及该幅说法图,而与洞窟其他壁面内容无关。由于第一组说法图下方的题记并未保存下来,但相邻第二、三、五、七组皆有题记保留,结构亦大体相同。我们以第二组说法图(图10)下方的题记为例,对供养人的参与性质进行具体说明,该处题记现已残损,《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所录内容如下:

夫至极阒旷,正为尘罗所约。圣道归趣,非积垒何能济拔。是以佛弟子比丘辨

^① [后秦] 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大正藏》,第14册,第555页。

化，仰为七世父母、所生母父，敬造迦叶佛一区（躯）并二菩萨。因此微福，愿亡者神游净土，永离三途。现在居眷位，太安吉普，及蠕动之类，速登常乐。大代大魏大统四年（538）岁次戊午八月中旬造。^①

题记明确记录了供养人出资绘制的图像内容为“迦叶佛一区并二菩萨”，与图像中所绘一佛二菩萨完全一致，根据同列其他几处说法图下方题记记载，第三铺绘“拘那含牟尼佛一区并二菩萨”，第五、七铺则皆为“无量寿佛一区（躯）并二菩萨”，大体都在榜题左侧绘女供养人，右侧绘男供养人，供养人的排列方向各朝向中间的榜题。此外，这四处说法图下方的题记书写时间分别为大统四年（538）八月中旬至次年五月二十一日，是在不同时期相对独立的情形下绘制的。这些迹象都表明，各组供养人所出资绘制的图像仅为相应的说法图，与洞窟其余壁面内容无关。因此，这种仅参与洞窟非常局部营建的行为，与 P. 2551V《李君莫高窟佛龕碑并序》所载“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的事迹相差太远，更与抄经活动中元荣动辄出资抄写百部、百卷或施钱三千文的行为存在过大反差，有悖于元荣作为东阳王的身份地位。



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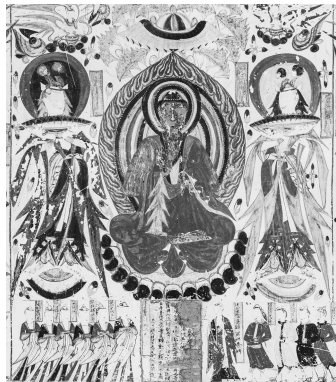


图 10

（图 9 莫高窟第 285 窟北壁西侧第一组说法图，采自数字敦煌 <https://www.e-dunhuang.com>；图 10 莫高窟第 285 窟北壁西侧第二组说法图，采自数字敦煌 <https://www.e-dunhuang.com>）

相比之下，不同于第 285 窟出现数次绘制中断的情形，第 249 窟的整体内容和风格更为统一完整，应当为一次性绘制完工的洞窟。第 249 窟的供养人分别绘于南北壁中央说法图的下方（图 11），着装较为统一，应当属于同一个群体。在数量和排列方式上，较第 285 窟北壁的供养人排列更为有序，其在敦煌的地位无疑更高。倘若两个洞窟南朝风格和新题材的出现与元荣家族有关，作为这一时期敦煌最有地位的执政者，元荣的身份显然符合参与营造第 249 窟。

^①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第 114-115 页。



图 11 莫高窟第 249 窟南北壁说法图及供养人像列

(采自数字敦煌 <https://www.e-dunhuang.com>)

此外，第 249 窟覆斗顶北披画面中的狩猎图并未出现于第 285 窟四披，似乎表明其出现不合乎佛教洞窟的主题思想，因此随后的壁画绘制中即不再出现。罗丰先生在分析固原东郊雷祖庙的北魏鲜卑墓漆棺画上狩猎图时，指出这些狩猎活动对鲜卑上层贵族有相当大的吸引力。^① 张庆捷先生也指出北魏墓葬中的狩猎壁画是鲜卑生活的真实写照。^② 结合前文关于第 249 窟覆斗顶东南北披的图像组合与东魏北齐鲜卑贵族墓壁画的比对，我们认为该类图像在敦煌的出现可能与鲜卑人参与的关联度非常高。元荣作为北魏宗室，自北魏至西魏任瓜州刺史，应当最有可能参与这些图像的选择与绘制。因此，我们推测，如果东阳王元荣参与了敦煌石窟的营建活动，第 249 窟的关联度可能更高。

结语

以上分析表明，敦煌莫高窟第 249、285 窟的南朝风格和新题材在元荣任瓜州刺史时出现，应当与其子叔和普泰二年（532）以后自京师洛阳返回有关。在营建时间上，第 249 窟早于第 285 窟完工的大统五年（539），更接近叔和的返回时间，该窟东、南、北三披新出现的祥瑞、升仙和狩猎图组合及配置方式，与同期河北磁县漳湾和山西忻州九原岗等地的鲜卑贵族墓相关图式结构接近，映射出敦煌与中原鲜卑贵族对这一题材组合的共同喜好；西披维摩诘经变的绘制，应与元荣在普泰二年为祈祷叔和平安归来出资抄写的百部《维摩疏》一事相呼应，使第 249 窟成为一个文本抄写与图像绘制产生交集的个案。因此，第 249 窟的营建，可能既是表达东阳王元荣及其家族类似还愿的心情，也是对庆祝叔和完成“谒诣修定”使命的庆祝。

① 罗丰《北魏漆棺中的波斯风格》，收入氏著《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72页。

② 张庆捷《鲜卑生活的真实写照——北魏墓葬中的狩猎壁画》，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466-476页。